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34(2014)01-0046-(08)

在汉代诗学背景下看曹丕、曹植诗歌之比较

汪春泓

(香港岭南大学 中文系, 香港)

摘要: 在《毛诗大序》等先秦汉代诗学著作中,关于诗歌的缘起,已经隐含着“言志”和“缘情”两种发展方向,到汉魏之际,诗歌迎来了蓬勃兴盛的契机,而曹丕和曹植这对兄弟恰好对应着“缘情”与“言志”之两端,分析这种差异,对了解曹氏兄弟的诗歌写作,大有帮助,而且认识到曹丕实乃六朝绮靡之先声,此乃文章的一得之见。

关键词: 言志; 缘情; 汉音; 魏响; 六朝; 绮靡

关于诗人创作成就之高下,在读者一边,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诗歌评价兼有客观和主观诸因素,有时意见相左,且水火不容,亦成为中国诗歌批评史上的公案。

建安文学彪炳史册,三曹、七子之盛名,成为时代的标志,而曹操之子曹丕、曹植,既为政治上的对手,又是文学上的劲敌,正因为两者均属大家,所以轩轻高低,就尤其不易。自古以来,见解纷纭,可谓莫衷一是矣。

清初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云:

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邪? 故嗣是而兴者,如郭景纯、阮嗣宗、谢客、陶公,乃至左太冲、张景阳,皆

不屑染指建安之羹鼎,视子建蔑如矣。降而萧梁宫体,降而王、杨、卢、骆,降而大历十才子,降而温、李、杨、刘,降而“江西宗派”,降而北地、信阳、琅邪、历下,降而竟陵,所翕然从之者,皆一时和哄汉耳。宫体盛时,即有庾子山之歌行,健笔纵横,不屑烟花簇凑。唐初比偶,即有陈子昂、张子寿挖扬大雅。继以李、杜代兴,杯酒论文,雅称同调;而李不袭杜,杜不谋李,未尝党同伐异,画疆默守。沿及宋人,始争疆垒。欧阳永叔亟反杨亿、刘筠之靡丽,而矫枉已迫,还入于枉,遂使一代无诗,掇拾夸新,殆同觴令。胡元浮艳,又以矫宋为工。蛮触之争,要于兴、观、群、怨,丝毫未有当也。伯温、季迪以和缓受之,不与元人竞胜,而自问风雅之津。故洪武间诗教中兴,洗四百年三变之陋。是知立“才子”之目,标一成之法,扇动庸才,旦仿而夕肖者,原不足

收稿日期: 2013-11-12

作者简介: 汪春泓,男,浙江嘉兴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以羈络骐驎。唯世无伯乐,则驾盐车上太行者,自鸣骏足耳。^①

王夫之此说,不可谓无见地,此是在《文心雕龙·才略》篇基础上,进一步翻案,甚至说“曹子建之于子桓,有仙凡之隔,而人称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论大抵如此。”^②关于这样的观点,今人需加以辨析。通观曹氏兄弟文章,首先,钟嵘《诗品》谓曹丕诗作,当时能见到的不过“百许篇”,而按诸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十九之三指出,《魏文帝集》在梁代保存23卷,而至于《宋史·艺文志》则仅残剩为1卷,明代张溥编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收《魏文帝集》2卷,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则编辑魏文帝文章于《全三国文》之卷四至卷八;^③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中魏文帝曹丕列于《魏诗》卷四,共计大约有长短不齐的诗歌作品47首,分别属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可以肯定,王夫之当年所见,盖不出此四十七首之范围,已非宋、齐全貌矣。^④而逯钦立《魏诗》卷六、卷七主要载录曹植诗作,其中保存完整的五言诗就有55首,数量远超曹丕五言之作。^⑤王夫之有感于明代诗人好主持坛坫,党同伐异,故为斯论,意见较为偏激。实际上,钟嵘《诗品》专论“五言”,而曹丕最具成就的当数乐府七言,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谈曹丕曰“是故传世七言,不用兮字,且出于一人手笔者,实以曹丕《燕歌行》二首为嚆矢!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⑥然则此《燕歌行》之外,要在曹丕为数不多的五言诗中,竟然看出曹丕、曹植非但不相伯仲,而且曹丕远在乃弟之上,此种裁断就有失客观。王夫之认为曹丕“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激赏其人在诗史上空前绝后,独树一帜,而追随曹植者,却代不乏人,由是即认为两者高下立判,虽借古讽今,有的放矢,却实在缺乏根据。

《世说新语·文学》第五十二条“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吁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⑦王夫之谓“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

……‘吁谟定命,远猷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遐心。”^⑧观上述曹氏兄弟之品第,显示王夫之本人作为读者,若过度地“各以其情而自得”,就会有失允当。

首先,中国诗歌历来秉承《诗》、《骚》之传统,为传统承前启后,这本是诗人的荣耀,而非瑕疵。而曹丕亦并非逸韵孤响,他在诗歌史上同样具有开创之功,对此,在本文后边将会论及;其次,曹植身后,考察诗歌史上的伟大诗人,何曾“不屑染指建安之羹鼎,视子建蔑如矣”?此种叙述有违事实,颇不可信,属于无稽之谈。^⑨比较曹丕、曹植诗歌的价值、地位及影响,绝不可意气用事,而今人则必须从中国诗歌发展脉络的角度,更加冷静地来审视两者的歧异,方可最终找到实事求是的答案。

奏刀之切入点,应该在乎汉代诗学之大背景,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指出“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⑩故而,三曹是在汉魏诗歌转型期的代表诗人,自然得联系汉代诗学理论,来观照其渊源、变迁。至于汉代诗学,要以《毛诗大序》最具价值,它在《尚书·尧典》之“诗言志”说、以及“孔子诗论”等儒家经典基础上,充分体现“通变”之精髓,堪谓极具推陈出新之功绩。其词曰:

《关雎》,后妃之德也……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⑪

上述阐释既论志,又谈情,前者阐述诗之功能,后者则发微诗之缘起,而“诗者,志之所之也”云云,一望而知,乃祖述《尚书·尧典》,此文最具价值者,乃在于志之外,还能看到情在《诗》中所具原动力的作用,虽未交代如何从志过渡到情,然

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它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有着相提并论之地位,意识到《诗》在“言志”之余,还有“抒情”之特质,广义之诗,乃由于情之不可遏制之产物,若《诗》仅具“言志”之功效,它就只会凸显政治性、群体性之一边,未免存在“偏枯”的局限,而若有“抒情”性,则可以润泽“言志”,使《诗》兼备抒写人生和个我之悠长、低回,与“言志”之刚健、激昂,恰可互为补充,刚柔并济,相映成趣。而在经学笼罩下,汉代精英阶层之诗歌趣味偏于“言志”,短于“抒情”,而作为开魏诗之风气的曹丕、曹植,也正好代表着“抒情”和“言志”之两端,于是,若要轻易品评其高下,则确实有简单化之嫌疑。因此,以下分别为之剖析,从而彰显二曹在诗歌史上的特殊意义。

1. 曹植坚守诗学传统,其诗以“言志”为主,兼顾“抒情”,体现以志帅情之特征

《魏志》记述,当曹操出征,与家人告别时,曹丕“泣而拜”,而曹植却“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去除阴谋论的理解,曹丕、曹植兄弟俩确实有性格上的差异,在情感处理上,曹丕比较人性化、世俗化,且表露自然,细腻体贴,不喜宏大叙事;而曹植则相反,他将天然感情儒家教化,化情为志,实际上就有点儿不能善解人意,此决定了两者命运的不同,也导致他们诗风之迥别。

文学史谈曹魏时期作家,有多种称谓:魏之三祖、三曹、建安七子、曹王、曹刘,等等,而如《文心雕龙·明诗》篇描述建安文学“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按其所指,乃三曹之曹操和曹植,或三祖之曹操耳,曹丕并不具备此种建安风骨,而曹王(曹植、王粲)、曹刘(曹植、刘桢)则更属此种风格的典型作家。

由于曹植最终失宠于乃父曹操,在兄长曹丕——篡汉之后的魏文帝,以及魏明帝的监控之下,基本失去了人生自由,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曰“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⑫此段文字中,“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这是曹植一以贯之的人生目标。故而,一旦受阻,愿望落空,壮志难酬,此种志向和怀抱就只能发泄于诗文之间,以达成

内心的平衡和慰藉。曹植人生被迫局限于“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⑬所谓画地为牢者也。所以曹植诗作均抒写其内心的呐喊,尚无暇顾及第一人称之为外的人和事。英国伯特兰·罗素著《权力论》之第一章《权力欲的冲动》说“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主要的是权力欲与荣誉欲。两者虽有密切关系,但并不等同……但是,获得权力往往是获得荣誉的最便捷的途径。”^⑭而在权力和荣誉之间,曹植渴望得到权力,深谙权力就是一切,反之,若失去权力,则意味失去一切;而曹丕竭力限制曹植的权力欲望,甚至许诺曹植及其他士人以将来的荣誉,所谓“声名自传于后”也,这种画饼充饥的诈骗,在七子均难以接受,何况曹植呢!一旦成为曹操继承人,曹丕消减了“权力欲”所导致的焦灼感,便从一己命运的挣扎中解脱出来,自可以游目骋怀于世间百态,作隔岸观火式的欣赏、品鉴,因而与曹植的诗风迥然不同。

在先秦至两汉时期,所谓“志”,具有坚毅不拔、顽强抗争之意义,按《史记·陈涉世家》云:“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屈原列传》引淮南王刘安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为之左证。故而,朱自清《诗言志辨》指出“志”就是“怀抱”,^⑮其理解比较接近真实。此在曹植的诗文当中,处处体现其志趣。

《盘石篇》云“仰天长叹息,思想怀故邦。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

《责躬》之《小序》云“臣等绝朝,心离志绝。”

《矫志》云“道远知骥。世伪知贤。”

《矫志》:“仁虎匿爪。神龙隐鳞。”

《赠徐干》云“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

《赠白马王彪》之六云“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

《杂诗》云“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

游……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妬》曰“嗟尔同衾,曾不是志,宁彼冶容,安此妬忌。”

《言志》曰“庆云未时兴,云龙潜作鱼。神鸾失其俦,还从燕雀居。”

《洛神赋》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⑥

从上述文字当中,可以体悟到曹植积极入世、期盼建功立业的内心世界,他不愧是曹孟德之子,与曹操之“壮心不已”,^⑦堪谓一脉相承。曹植坚持“志士营世业”、“丈夫志四海”、“闲居非吾志”胸襟开阔,志存高远,然则他遭遇现实的阻碍,强势的碰撞,激发一股悲愤的力量,却更令其诗作激情饱满。所以,其作品中多有势大力沉的种种意象,譬如其《杂诗》云:

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
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
方舟安可极,离思故难任。
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
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
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

高台、悲风、万里、孤雁等,一起构成悲壮、哀怨之意境,而作者虽心潮澎湃,然其不屈不挠之心志却依然不减,形成孤独却执着、受压却反抗的巨大张力,笔端多次流露“悲风”一词,甚至连风卷云舒,都裹挟着其悲怆,比兴之间,真正焕发出感发意志的光芒,矢志不渝,穷且弥坚,堪谓儒家诗学“诗言志”精神之嫡传。故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称“然子建真《风》、《雅》之苗裔,非陶公、李、杜则无媲美之人也。”^⑧按《左传·昭公九年》曰“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⑨《孟子·公孙丑》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庄子·达生》篇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陆贾《新语》卷下《怀虑》第九说“养气治性,思通精神,延寿命者,则志不流于外。”^⑩贾谊《新书》卷第八《道德说》说:“《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也,故曰‘《诗》者,此之志者也’。”^⑪《汉书·二疏

传》记载:“(疏)广曰‘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综上所述,可见“志”反映诗人坚定的主体意识,具有自信、正义的品格,凝聚了儒家所肯定的高尚精神和人生信念,如《孟子》所言,人格培养,需要养气,而终究要靠“志”来为人生指出向上一路。

钟惺《古诗归》卷七云“子建柔情丽质,不减文帝,而肝肠气骨,时有磊块处,似为过之。”由于政治处境之不同,令曹子建诗在“肝肠气骨”和“磊块”特征方面,为曹丕所不及,而这也是所谓建安风骨之主要特质。

许学夷《诗学辨体》卷四第二十三则曰“建安七子虽以曹刘为首,然公干实逊子建。子桓《与吴质书》称公干‘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伦’,正以弟兄相忌故耳。”^⑫由于曹植较好地处理诗歌中志与情的融合关系,而刘桢却虽“贞骨凌霜”,“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⑬显然存在着“言志”有余而“抒情”不足之缺失,所以子建成就当远在公干之上。曹植诗作,主文而谲谏,俊逸而低回,钟嵘《诗品》为之推崇备至,其词曰“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夫!陈思王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故孔氏之门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此对照刘安所言“《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意指曹植五言诗作,只不过去掉了“兮”字,实质上,乃屈《骚》之同调,两者可谓异曲而同工,曹子建诗歌志、情兼得,并且属以志帅情者也,为五言诗写作,他树立了典范!

2. 曹丕诗以情掩志,缘情婉丽,开齐梁绮靡之先声

在汉末曹魏之际,若以文人五言诗为一种诗歌体式,“诗言志”的诗多数是四言,故而,五言就算是新形式了,而曹植、曹丕作品思想、情感存有差异,然则,相对而论,曹植更属新瓶旧酒,归属“言志”的一派;而曹丕则更多属于新瓶新酒,因为他偏离了“诗言志”的儒家诗学传统,偏向乎

“缘情”一路。当时,诗歌创作日益趋向泯灭志和情之界限,早在汉武帝《秋风辞》曾曰“欢乐极兮哀情多。”在诗歌中自然流露出悲情。根据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八)引吕氏说“太乐令丞所职,雅乐也;乐府所职,郑卫之乐也。”²¹汉代音乐分雅、俗,联系乐府诗之入乐,其分野主要表现在“志”与“情”的歧异。见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九十八《诗一》记载刘歆云“诗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²²公然标举“诗以言情”,显然是和“诗言志”分庭抗礼,认为诗是用来抒情的,它代表了一种新的诗学观,隐约与“诗缘情”相通。钟嵘《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曹丕《善哉行》其二云:“流郑激楚,度宫中商。”反映俗乐之流行,所以,五言诗兴起,在某种意义上而论,乃俗情突破雅志,亦预兆着抒情时代的来临。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礼记·礼运》篇曰“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所以广义的诗之抒情,相较于“诗言志”,凸显出自然的状态,甚或潜意识的流露,似乎在不经意间,吟咏内心之七情。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情”为“人之含气有欲者,从心青声。”²³所以,抒情还连带着人欲望之呈露。按《文心雕龙·明诗》篇曰“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²⁴刘勰回应了《毛诗大序》所涉志、情两端,关于“诗言志”,自不待言,而至于“情动于中”云云,他借鉴了“诗者,持也,持人情性”的观点,足见刘勰恪守汉儒诗学,对于诗歌抒情性心存保留,还是要以“言志”来节制“缘情”,切忌对诗歌“缘情”放任自流,以致颠覆“诗言志”的悠久传统。

而关于此种诗学新趋势,在古人论述中尚有迹可循,西晋陆机《文赋》云“颐情志于典坟。”²⁵其“情志”并举,已见端倪,并且倡言“诗缘情而绮靡”,显然对诗这一文体具有革命性的改造,“缘情”和“言志”其间之差异,相去甚远,这种差异恰好体现在曹丕、曹植兄弟的诗歌创作之中。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叙述“周室既衰,风流弥着,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自兹以降,情志愈广……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两汉文学主要凸显《尚书·尧典》“诗言志”的传统,陆机提倡“诗缘情而绮靡”,故其所谓“情志愈广”与陆机合若符契,隐含着诗歌“言志”和“缘情”两股力量的角力,“志”者既指巍然激昂,又洋溢着心胸向外扩张的力量;而“情”者则指向内心,显得低回优柔,感触纷杂。²⁶两者大致分别代表美学上“崇高”和“优美”的特点,亦适合不同之语境。尤其值得关注者,此节文字突出地叙及“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何谓“艳发”,乃指张衡某些特定的作品,譬如,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一《体制类》第十则曰“王弼州云‘平子《四愁》,千古绝唱。’”²⁷张衡《四愁诗》之一曰“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依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²⁸此作或可作多层次的解读,然而其思念美人的大胆表白,还是不容否认的,此诗遂特具风人之致,成为这个时代罕见的作品。

而曹丕诗歌在精神气韵方面恰好上承张衡的“艳发”、“情变”,堪称一脉相承者也。徐祜卿《谈艺录》云“《燕歌》开其靡。”²⁹其所指不言而喻,认为六朝之“绮靡”,曹丕《燕歌行》实有肇始之功。《燕歌行》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
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作所营造的诗歌意境纯然是柔情思念,哀怨清婉,并与“草木摇落”的悲秋情调相结合,更凸显感人的力量,沈德潜《古诗源》的读后感曰:

“和柔巽顺之意,读之油然相感。”然而,此诗关乎男女私情,却与政治无涉,属于“缘情”而非“言志”。所以在署名徐陵编《玉台新咏》中,既收录张衡的《同声歌》、《四愁诗》,亦收入上述曹丕之《燕歌行》和《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③,看来宫体艳情一派视张衡和曹丕为同调,且尊之犹如先驱。梁慧皎《高僧传》卷第十三《经师》云:“论曰:夫篇章之作,盖欲申畅怀抱,褒述情志。咏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辞韵相属。故《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也……”^④此处“篇章”大概指诗歌除外的“文”,它们亦须“申畅怀抱”,且“褒述情志”,“情”、“志”尚且兼容,而诗歌则纯粹以唯美抒情为风尚,这里作者将《毛诗大序》后边部分“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忽略,以“缘情”诗学观遮蔽“言志”诗学传统,令“诗缘情”后来者居上,以致后之学者产生误解,如唐代孔颖达在《左传·昭公廿五年》“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下,其《正义》曰“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⑤孔氏就几乎将“情”来置换“志”了,而这种置换,若在具体历史时段作考察,就并不符合实际,仅在曹丕和曹植兄弟诗歌写作中,“情”与“志”就不可混为一谈。

曹丕《陌上桑》云“伴侣单,稍稍日零落,惆怅窃自怜,相痛惜。”

《善哉行》其四云“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

《燕歌行》其二云“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摧肺肝。”

《黎阳作诗》曰“彼桑梓兮伤情。”

《善哉行》其一云“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人生若寄,多忧何为!”

曹丕偏好抒发一种不可自持的感伤之情,哀情袭来,诗人似乎难以承受,多情缠绵,百感交集,此几乎可视作典型的人文情怀,与其政治人物理应端重的身份不相符合,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说“文帝《芙蓉池》……收四句义意亦本前人习语,然足以窥其全无整躬经远之志,但极荒乐而已。”^⑥此或许并非失态,而是要以“纯文学”来麻

痹其他士人的政治热情,即转移或回避敏感政治话题之谓也;尤其引人注目者在于曹丕虽然也有慷慨之作,但作品更多展现“以悲为美”美学思想,当然,同样写悲,曹植属于悲壮与俊逸,而曹丕则显得悲伤而凄清,譬如《寡妇诗》,竟以当时副丞相的身份,在友人阮瑀死后,作诗玩味阮瑀妻子的悲苦之情。故而,假如其书写属于一种政治谋略,然则,无意之间却与“缘情”、“绮靡”之文学路径相通,具有开六朝风气的作用。中唐白居易《与元九书》发表了极其偏激的言论,认为汉末时期“六义始缺”,至于“晋、宋以还,得者盖寡……于时,六义寔微矣”,而“陵夷至于梁陈间……于时,六义尽去矣”。^⑦无论如何,此从一个侧面,亦反映曹丕所代表的新诗风,其转移风习之力,不可谓不既深且广矣。

江淹《杂体诗序》曰“然五言之兴,谅非复古。但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⑧此序追溯五言诗之发展,指出这是一种晚近出现的文体,然而,在关西、邺下以及河外、江南,不同时空环境之中,五言诗出现种种变异,其内在原因十分复杂,然而,诗风流转,邺下和江南并非无所关联,其间之关系,隐约看见曹丕与南朝宋齐文学存在着某种衔接性。谢榛《四溟诗话》卷一云“陆机《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夫‘绮靡’重六朝之弊,‘浏亮’非两汉之体。徐昌穀曰‘诗缘情而绮靡。则陆生之所知,固魏诗之查秽耳。’”^⑨徐昌穀彻底否定陆机《文赋》所代表的诗学方向,实质上,此种观点与钟嵘《诗品》并无二致,《诗品》推崇曹植,则以曹丕为非主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曰“少卿离辞,五言才骨,难与争鹜。桂林湘水,平子之华篇,飞馆玉池,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其所谓“少卿离辞”,指李陵《与苏武诗》,“桂林湘水”,乃指张衡《四愁诗》,而“飞馆玉池”则隐喻曹丕与七子及吴质等人之交游,^⑩而此三者并列,说明萧子显也认同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平子艳发”的见解,体察曹丕诗歌趣味风格近乎李陵和张衡,所以,钟嵘《诗品》指曹丕“其源出于李陵”,并非空穴来风,只是此种判断稍嫌虚而不实,曹丕和李陵之间的渊源关系乃从宏观着眼,大

致上基于排斥此辈于“诗言志”主流传统之外的考虑。而对此三者,沈约、萧子显及南朝其他诗学学者则特加表彰,以为弥足珍贵,其意亦在为自己张目。关于近代以来诗歌发展的趋势,沈约、萧子显和江淹之所见,大致殊途同归,其间沈约、萧子显持新变的观点,而江淹则属于调和派,足证针对当时诗歌发展,诗坛产生了意见分歧。尤其钟嵘矫矫立异,虽时人也赞美曹植诗歌成就,但他扬植而抑丕,却别有意味,昭示着对儒家诗学传统的坚守,钟嵘将所评鹭的诗人分归于《国风》、《小雅》及《楚辞》三个源流,而李陵、曹丕追根溯源至于《楚辞》,而非《风》、《雅》,就是暗指其人其作有所不正。

关于五言诗主题,钟嵘亦崇尚抒写悲怨,然而与曹丕依然存在不同之处。在五言诗技巧方面,钟嵘认为曹植达到完美境界,而曹丕则难免尚未能找到五言诗的语言,时而碌碌如玉,时而却落落如石,显得良莠不齐,曹丕以情掩志,多写悲秋闺怨等主题,而钟嵘所提倡的“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云云,两者相较,则曹丕诗歌显得纤细柔弱,消减了钟嵘所谓“诗可以怨”的浑厚力度,实际上,其所不满于曹丕者,得无正是当时诗坛所显露出来的绮靡之风乎?

注释:

- ①见《姜斋诗话笺注》,王夫之著,戴鸿森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至106页。
- ②见《姜斋诗话笺注》,第118页。
- ③《隋书经籍志考证》,收于《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5707至5708页。
- ④《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辑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曹丕诗载于第389至406页。
- ⑤《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载曹植诗于第421至464页。
- ⑥《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三编《魏乐府——附吴》第三章《曹丕七言乐府》,萧涤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 ⑦《世说新语校笺》,刘义庆撰,杨勇校笺,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6页。
- ⑧《姜斋诗话》卷一《诗译》,见《姜斋诗话笺注》,王夫之著,戴鸿森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 ⑨譬如传说谢灵运就曾盛赞曹子建“才高八斗”。
- ⑩《古诗源》,沈德潜撰,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3页。

- ⑪见《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9至270页。
- ⑫《文选》卷四十二,萧统编,李善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94页。
- ⑬曹丕《典论·论文》。
- ⑭《权力论》,英国伯特兰·罗素著,吴友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页。
- ⑮《诗言志辨》,朱自清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1页。
- ⑯曹植作品,本文根据《曹植集校注》,曹植著,赵幼文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 ⑰《步出夏门行》,见《曹操集》之《诗集》,曹操著,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页。
- ⑱《养一斋诗话》,潘德舆著,朱德慈辑校,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页。
- ⑲《春秋左传集解》,左丘明撰,杜预集解,李梦生整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643页。
- ⑳陆贾《新语校注》,王利器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9页。
- ㉑贾谊《新书校注》,阎振益、钟夏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4页。
- ㉒《诗学辨体》,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 ㉓《诗品》上品之《魏文学刘桢诗》,见《诗品集注》,钟嵘著,曹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 ㉔收录于《四库全书》卷八五《史部·目录类一》,共十卷。
- ㉕《经义考新校对》,林庆彰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0页。
- ㉖《说文解字注》,许慎撰,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01页。
- ㉗《诗含神雾》曰“诗者,持也,以手维持,则承负之义,谓以手承下而抱负之。”见《纬书集成》,日本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页。
- ㉘《文赋集释》,陆机著,张少康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 ㉙《谈艺录》云“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明人徐祯卿撰,何文焕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65页。
- ㉚《带经堂诗话》,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戴鸿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4页。
- ㉛《张衡诗文集校注》,张衡著,张震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 ㉜《谈艺录》,第768页。
- ㉝使用明小宛堂覆宋本《玉台新咏》,徐陵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 ㉞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07页。
- ㉟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见《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108页。
- ㊱《昭昧詹言》,方东树著,汪绍楹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68页。

⑳《白居易集》卷四十五《书序》,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59页。

㉑《江文通集汇注》卷四,江淹撰,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6页。

㉒《四溟诗话》,谢榛著,宛平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8页。

㉓《文心雕龙·明诗》篇形容为“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etry of Cao Pi and Cao Zhi on the Poetic Background of Han Dynasty

WANG Chunhong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Abstract: In such poetic works of Pre-Qin and Han as *Maoshi Daxu* (*Mao Book of Poetry: General Prologue*),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poems unfolded the orientation of the theory of “poetry to express aspirations” and “poetry to express feelings”, and during Han and Wei Dynasties the poetry was flourishing. Cao Pi and Cao Zhi were the representative poets of the school of “poetry to express aspirations” and “poetry to express feelings”.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etry of Cao Pi and Cao Zhi is beneficial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ir poetic creation, and the paper holds that Cao Pi was the pioneer of emotive and gorgeous poetry of the Six Dynasties.

Key words: poetry to express aspirations, poetry to express feelings, Han characteristic style, Wei characteristic style, Six Dynasties, emotiveness and gorgeousness

(责任编辑:吴澄)

(上接第45页)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Leading Role of CPC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Democratic Parties

WU Zhenmei

(College of Marxis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juvenate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gether with cooperation with the democratic parties in the past decades succeeded i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cause. During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democratic parties, CPC has accumulated experience in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first, CPC united the democratic parties and democratic personages with set goals expressed in slogans; second, CPC had powerful leadership and confidence in the democratic parties and democratic personages; third, CPC, the democratic parties and democratic personages held firm stand to the road of rejuvenation.

Key words: CPC, leading, the democratic parties, united front

(责任编辑:申浩)